



21st Century Academic Books

21世纪学术文库（第一辑）主编／岳麓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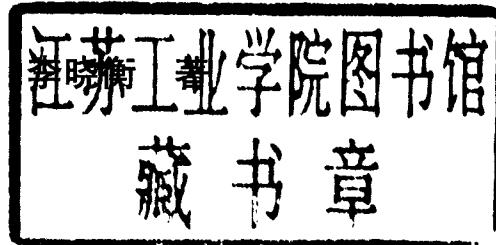
Zhongguo Renkou Wentí de Fenxi yu Sikao
中国人口问题的分析与思考

李晓衡 ● 著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1世纪学术文库（第二辑）丘尊社主编

中国人口问题的分析与思考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人口问题的分析与思考/李晓衡著.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6. 7

(21世纪学术文库·第2辑)

ISBN 7-81108-230-6

I. 中… II. 李… III. 人口 - 问题 - 研究 - 中国

IV. G924. 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78863 号

21世纪学术文库(第二辑). 中国人口问题的分析与思考

作 者: 李晓衡

责任编辑: 格 森

封面设计: 布拉格

出版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编: 100081

电话: (发行部) 68472815 68933837 传真: 68932751

电话: (总编室) 68932218 传真: 68932447

印 刷 者: 廊坊市长虹印刷有限公司

发 行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48.5

字 数: 1216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7 月第 1 版 200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1108-230-6/A·32

定 价: 68.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两种生产与人类社会发展	(1)
第一节	两种生产与人类社会发展：从劳动生产率的角度看（上）	(1)
第二节	两种生产与人类社会发展：从劳动生产率的角度看（下）	(9)
第三节	两种生产与人类社会发展：从人均生活水平的角度看（上）	(22)
第四节	两种生产与人类社会发展：从人均生活水平的角度看（下）	(33)
第二章	两种生产与人类生存环境	(45)
第一节	两种生产与人类生存环境：从非再生资源与生态环境的角度看（上）	(45)
第二节	两种生产与人类生存环境：从非再生资源与生态环境的角度看（下）	(56)
第三节	两种生产与人类环境：从可再生资源与生态环境的角度看（上）	(68)
第四节	两种生产与人类生存环境：从可再生资源与		

· 2 · 中国人口问题的分析与思考

	生态环境的角度看（中）	(79)
第五节	两种生产与人类生存环境：从可再生资源与 生态环境的角度看（下）	(89)
第三章	两种生产的理论与当代中国的现实	(98)
第一节	当代中国两种生产严重失调的表现：从劳动 生产率和人均生活水平的角度看	(98)
第二节	当代中国两种生产严重失调的表现：从自然 资源和生态环境的角度看（上）	(107)
第三节	当代中国两种生产严重失调的表现：从自然 资源和生态环境的角度看（下）	(114)
第四节	当代中国两种生产严重失调的原因：从社会 经济根源的角度看	(123)
第五节	当代中国两种生产严重失调的原因：从社会 政策根源的角度看	(135)
第六节	当代中国两种生产严重失调的对策：可持续 发展战略与人口数量和人口质量	(142)
第七节	当代中国两种生产严重失调的对策：可持续 发展战略与消费方式和生产方式	(156)
附录一	重评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	(170)
附录二	关于中西人口观之差异	(183)
附录三	湖南人口发展的分析与思考	(196)

第一章 两种生产与人类社会发展

第一节 两种生产与人类社会发展： 从劳动生产率的角度看（上）

在马克思、恩格斯眼中，无论是原始社会还是文明社会，物质生产和人类自身生产都是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因为正是这两种生产之综合，构成了“直接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形成了现实的社会生产力，从而为人类社会进步提供了最为深厚的物质基础。

那么，具体而论，两种生产又是通过一种什么样的途径影响人类社会进程的呢？

我们认为，两种生产决定人类社会进程的一般途径是：物质资料生产与人类自身生产的关系协调与否，一是直接影响着劳动生产率的高低，从而从根本上决定了旧的社会形态向新的社会形态质变的可能性；二是直接影响着人均生活水平的高低，从而从根本上决定了同一社会形态在其自身的量变范围之内，是处于稳定发展，还是陷于社会动荡。

我们首先讨论两种生产与劳动生产率从而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

众所周知，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人类社会发展之所以可能作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不断由低级而高级地向前进步，归

根结底是因为生产力推动作用的缘故。故此，列宁才直截了当地将“生产力的发展”视为“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①。毛泽东也明确宣称：“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②

然而唯物史观同时认为，并非任何一种意义上的生产力的发展，都能成为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即将生产力的发展明确区分为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现有生产力的量的扩大（例如，开垦新的土地）”，一种是“新的生产力”的诞生即生产力在“质量上的发展”。^③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亦指出：“生产力的发展表现在两方面：第一，表现在已经生产出来的生产力的量上，表现在新的生产借以进行的生产条件的价值量和数量上，表现在已经积累起来的生产资本的绝对量上。第二，表现在投在工资上的资本部分同总资本相比的相对微小上，即表现在为一定量资本的再生产和增殖、为进行大量生产所必需的活劳动的相对微小上。”^④

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看来，所谓生产力在“质量上的发

① 《列宁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23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02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1、15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76页。

展”，就是指相对少的劳动量能够推动相对多的生产资料，也就是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与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在马克思看来，并非是生产力在量上的扩张而是其在质上的飞跃，才是推动人类社会发生质变的决定性力量。并且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资本论》干脆将“劳动生产力”直接等同于“劳动生产率”，将“劳动生产力提高”直接等同于“劳动生产率的发展”。^① 马克思说得很明确：“生产力当然始终是有用的具体的劳动的生产力，它事实上只决定有目的的生产活动在一定时间内的效率。”惟其如此，“劳动生产力越高，生产一种物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就越少，凝结在该物品中的劳动量就越小，该物品的价值就越小。相反地，劳动生产力越低，生产一种物品的必要劳动时间就越多，该物品的价值就越大”。^②

同样基于这样一种认识，视“生产力的发展”为“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的列宁，也明确宣称：“劳动生产率，归根结底是使新社会制度取得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他反复强调，农奴制之所以能够取代奴隶制，是因为农奴制创造了奴隶制下所没有过的劳动生产率；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取代农奴制，也是因为“资本主义创造了在农奴制度下所没有过的劳动生产率”；而他认为社会主义之所以有可能取代资本主义，同样是“因为社会主义能创造新的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③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4 年版，第 292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4 年版，第 59、53 页。

③ 《列宁全集》第 5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8 页。

人类社会的发展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的关系，当是无可怀疑的了。那么，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与两种生产的协调与否，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对劳动生产率这个概念本身作一点分析。众所周知，从经济学的投入产出分析的角度来看，所谓劳动生产率指的是劳动者生产某一产品的效率。这种效率通常用劳动量与产品量的比率来表示，其高低为单位劳动时间内所生产的产品量的多少，或为生产每单位产品所消耗的劳动量的多少。但如果从唯物史观关于两种生产的学说的角度来看，则劳动生产率可以用同一劳动量所推动的生产资料量来表示。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即是：“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水平就表现为一个工人在一定时间内，以同样的劳动力强度使之转化为产品的生产资料的相对量。”并且如果确从这样一个角度来分析，则一方面，“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表现为劳动的量比它所推动的生产资料的量相对减少”；另一方面，“工人用来进行劳动的生产资料的量，随着工人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而增长。”^① 不言而喻，如果从后一个角度来看劳动生产率，则劳动生产率的高低与否与两种生产的协调与否，关系就非常密切了。因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客观上就意味着，当物质资料生产所能够提供的生产资料量是一个定数时，人类自身生产所能够提供的劳动量就必须减少；或者当人类自身生产所能够提供的劳动量是一个定数时，物质资料生产所能够提供的生产资料量就必须增长。反之，如果人类自身生产能够提供的劳动量是一个定数时，物质资料生产所能够提供的生产资料量并不能相应增长；或者，如果物质资料生产所能够提供的生产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82—683页。

资料量是一个定数时，人类自身生产所能够提供的劳动量并不能相应减少，则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就势必成为泡影。当然，最为理想的状况是，一方面物质资料生产所提供的生产资料量能够绝对增长，另一方面人类自身生产所提供的劳动量能够相对减少，如果两种生产之间的关系能够协调如此，则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就几乎是确定无疑的了。

历史已经证明了我们的分析。以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为例，这个国家的劳动生产率之所以自工业革命以后能够突飞猛进地提高，其客观前提就是社会所拥有的物质资料绝对增长而人口相对减少：一方面，通过殖民贸易，当时的“英国能够以最便宜的价格买到美洲和东欧的小麦和玉米、澳大利亚和阿根廷的肉类、丹麦的乳制品、帝国领地和中美洲的热带物产、马来西亚的锡、南美洲的铁、斯堪的纳维亚的木材，等等”；^①另一方面，通过“强迫移民”，从 1815 年至 1914 年这一百年间，英国共向海外移民 2000 万人，几为 1900 年时其本土 4100 万人口的一半。其间仅 1844 年至 1858 年，英国就对外移民 340 万，平均每年达 20 万人以上，以致一度出现对外移民人数超过国内人口自然增长数的奇异社会现象。^②

再以资本主义世界的后起之秀——日本为例，这个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劳动生产率的迅速提高，也同样是与物质资料的绝对增长和人口的相对减少相伴随的：一方面，通过对对外贸易，这个资源贫乏的岛国从海外进口了占国内生产需求总

① （法）米歇尔·博德：《资本主义史：1500—1980》，北京，东方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23 页。

② （英）保罗·肯尼迪：《为 21 世纪作准备》，北京，新华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4 页；

量 90%—100% 的工业资源，包括石油、天然橡胶、铁矿石、铜、磷、镍、原煤以及羊毛、棉花等等；^① 另一方面，通过政府强制推行节制生育，日本仅用十几年时间就完成了欧洲国家用一百多年时间才自发完成的“人口革命”，实现了人口再生类型由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迅速过渡。其间仅 1947 年至 1979 年，其人口出生率就由 34‰ 急剧下降到了 14‰。^②

古典经济学的边际效用理论认为，尽管物质资料生产的技术水平的高低极其重要，但劳动生产率的高低根本上是由劳动者所能够处置的生产资料的数量决定的。与一定量的劳动力相结合的生产资料越多，或者与一定量的生产资料相结合的劳动力越少，劳动生产率就越高，否则就越低。这其实也就是前引马克思所说：一方面“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表现为劳动的量比它所推动的生产资料的量相对减少”，另一方面“工人用来进行劳动的生产资料的量，随着工人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而增长”。根据这一原理，英国经济学家坎南曾经提出这样一条“人口法则”：“在任何一定时期，在一定面积的土地上生存，而能适应于获得产业最大生产率的人口数量是一定的。”^③

这即是说，在某一时段内，当其他条件均不变化时，随着劳动投入的增加，其收益亦会按等比例增长。当劳动投入增加

① 金明善等：《日本：走向现代化》，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351—354 页。

② 张纯元等：《人口经济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351—354 页。

③ （英）埃德温·坎南：《初等政治经济学》，《人口问题资料》，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0 年版，第 220 页。

到一个特定点即坎南所谓“最大收益点”时，收益也就会相应地达到最大。在此之后，随着劳动投入的增加，收益的绝对量虽仍可能继续增长，但却不再可能依劳动投入量的增加而成比例地增长，相反会随着劳动投入量的增加而成比例地递减，即出现所谓“边际收益递减现象”——至少在 1949 年以前，中国的农业生产所呈现的就是这样一种可悲的局面。

作为农耕文明发育得最早、最成熟的国家之一，我国单位面积的粮食产量历来相当高。早在战国中晚期，亩产即达 216 斤。其后随着人口的增加及相应的劳动投入量的增长，秦汉之际上升为 264 斤，唐朝上升为 334 斤，明朝上升为 346 斤，清朝前期又上升为 367 斤。^① 然而，与粮食亩产随着人口增长和劳动投入量增加而缓慢上升的同时，却是劳动生产率的急剧下降。早在战国中晚期，我国一个农业劳动力便能年生产粮食 3318 斤。唐时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为 4524 斤。此后便逐渐下降，明时尚维持在 4027 斤的水平上，到有清一代，便急剧下降为 2262 斤。至 1949 年，更是降低到中国历史上的最低点——1150 斤，几乎只有战国中晚期的三分之一！^②

毫无疑问，“只有当土地所出产的东西超过耕种者所需要的生活供应时，才值得开垦土地”。不过出于经济理性的考虑，并非只要产出大于投入，人们便值得去开垦土地。以法国传统农业社会为例，在通常情况下，只要在某一块土地上从事劳动的投入产出比低于边际生产率，农民们便会自觉不自觉地

^① 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北京，农业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94—195 页。

^② 胡戟：《从耕三余一说起》，北京，《中国农史》1983 年第 4 期。

将这种经济上得不偿失的劳动投入降下来。^①

同理，既然中国的土地资源在既定的国土条件下为一不增之常数，那么为了维持劳动生产率的高水平，中国农民亦应当将劳动集约投入的水平降下来，降到坎南所谓的“最大收益点”为止。然而实际上，由于中国历史上两种生产严重失调，这种理论上的可能在现实生活中却是一种绝对的不可能。唐代以前，中国也曾有过地广人稀的景象。据统计，公元初年，中国耕地面积达 8.27 亿亩，人均 13.88 亩。唐代耕地面积达 14.3 亿亩，人均 17.88 亩，为历史最高点。不言而喻，在人地关系如此宽松的背景下，即使中国的人口再有所增长，其相应增加的劳动力亦可以向土地的“广度”而非“深度”进军，而大可不必将大量劳动力集中投向一小块已经极其有限的土地，从而导致劳动生产率的下降，尽管由于劳动投入高度集约化所形成的精耕细作生产方式仍在促使粮食单产缓慢增长。关键的问题是宋明以后，与中国可开垦之荒地资源几近枯竭的同时，中国的人口数量却仍在急剧膨胀，由此便造成了人地关系的日趋紧张：北宋人均耕地为 6.6 亩，明代为 4.17 亩，清末为 2.95 亩，1949 年跌至历史最低点，为 2.7 亩。^② 不言而喻，在两种生产的关系失调至如此境地的背景下，尽管劳动生产率的下降已经不可避免，但为了挣扎着活下去，中国农民除了完全不计效益地实施劳动密集投入以求单位面积产出增加些许而外，还能有任何别的出路吗？

① （法）阿尔费雷·索维：《人口通论》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版，第 139、145 页。

② 胡鞍钢：《中国：走向 21 世纪》，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5 页。

20世纪20年代以来，我国学术界在讨论近代中国落伍的原因时，就一直有学者认为，中国之所以迟迟未能由君主专制社会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完全是由于人口太多之故。而这一见解也一直受到不同意见的批评。应该承认，批评的一方是有道理的。因为实际上，人口数量的多寡与社会形态的变更确实没有直接的联系。但如果我们把人口极度过剩这一事实纳入两种生产的范畴来分析，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因为两种生产学说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人类自身生产所能够提供的劳动量如果多于物质资料生产所能够提供的生产资料量，就势必造成社会劳动生产率的下降，而社会劳动生产率的下降又势必是要从根本上迟滞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的。马克思说得好：“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并且首先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①

而由于人类自身生产严重失控造成的人地关系严重失调，我国近代农业劳动生产率不仅远远低于同时期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高水平，而且远远低于中国历史上两千年前就曾达到过的高水平。如此一来，当时的中国连民族的生存延续都难以为继，更遑论向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转变与发展了！

第二节 两种生产与人类社会发展： 从劳动生产率的角度看（下）

当然，说物质资料生产所能提供的生产资料量在比例上少于人类自身生产所能提供的劳动量，将势必导致劳动生产率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885页。

的下降，并不等于说如果物质资料生产所能提供的生产资料量在比例上大于人类自身生产所能提供的劳动量，就一定意味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因为生产资料量在比例上大于劳动量，只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否则就不可能解释为什么欧洲殖民者发现“新大陆”之前，处于地广人稀的印第安土著面对极其丰饶的物质资源，美洲的劳动生产率何以一直停留在原始社会的水平上。

那么还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劳动生产率才有可能得到提高呢？一言以蔽之，就是新的生产工具被采用。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劳动生产率的高低与否取决于“工具的完善程度”^①。至于劳动生产率的水平高低为什么会表现在生产工具的发展程度上，马克思也有一个明确的回答：“不言而喻，从事物的本性可以得出，人的劳动能力的发展特别表现在劳动资料或者说生产工具的发展上。正是这种发展表明，人通过在两者之间插入一个为其劳动目的而安排规定的、并作为传导体服从于他的意志的自然物，在多大的程度上加强了他的直接劳动对自然物的影响。”^②也就是说，尽管“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过程。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但仅仅依靠自身的“自然力——臂和腿、头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7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7页。

和手”，人类是无法大规模地推动劳动对象，从而大规模地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要达此目的，人类就只能利用生产工具这一“劳动者置于自己和劳动对象之间、用来把自己的活动传导到对象上去的物或物的综合体。劳动者利用物的机械的、物理的和化学的属性，以便把这些物当做发挥力量的手段，依照自己的目的作用于其他的物。……这样，自然物本身就成为他的活动的器官，他把这种器官加到他身体的器官上，不顾圣经的训诫，延长了他的自然的肢体”^①。

正因为只有依靠生产工具的不断创新，人类才能不断地扩大自己所能推动的劳动对象的数量，因而也才能提高社会的劳动生产率，进而才能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向前迈进，所以马克思、恩格斯才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强调，所谓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去说明社会发展，其实也就是“以生产工具为出发点”去说明社会发展。^②

例如，人类社会之所以会有原始社会与文明社会的不同，他们认为，其根源就在于“自然形成的生产工具和由文明创造的生产工具之间的差异”^③；而文明社会之所以会有奴隶制、封建制和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同，其根源也在于“由文明创造的生产工具之间的差异”，所以他们强调“没有蒸汽机和珍妮走锭精纺机就不能消灭奴隶制，没有改良的农业就不能消灭农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1—20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9页。

奴制”^①，等等。

到了《资本论》中，马克思的上述思想就更明确了。他指出：“动物遗骸的结构对于认识已经绝迹的动物的机体有重要的意义，劳动资料的遗骸对于判断已经消亡的社会经济形态也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② 至于恩格斯，他也根据自己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取得的研究成果宣称：“正如蒙昧人和野蛮人的工具同他们的生产分不开一样，轮作制、人造肥料、蒸汽机、动力织机同资本主义生产也是分不开的。正如现代工具制约着资本主义社会一样，蒙昧人的工具也制约着他们的社会。”因此，“一说到生产资料，就等于说到社会，而且就是说到由这些生产资料所决定的社会”。^③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并非仅仅从生产工具的创新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一个角度来说明生产工具对于社会发展的决定作用。他还指出：“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④ 所谓劳动资料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这很容易理解，马克思显然是就生产工具创新与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关系而言的。至于说劳

① 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8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204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6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4 年版，第 169—170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204 页。